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 《东方杂志》研究 (1904—1948)

Dong Fang Za Zhi Yan Jiu

陶海洋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sisheng

Dong Fang Za Zhi Yan Jiu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陶海洋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陶海洋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650 - 1945 - 6

I. ①东… II. ①陶…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1904 ~ 1908  
IV. ①G239. 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274 号

##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陶海洋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40.2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768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

ISBN 978 - 7 - 5650 - 1945 - 6

定价: 6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 总 序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起，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名改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所获得的真诚。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次年起我开始招收学生。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29种著作，预计今后几年内将达到50种左右的规模。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不论这一个

案有没有价值。

回顾招收博士生以来的教书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我的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年龄大小、从事过什么工作，他们为了读书求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坦诚相处，教学相长，虽然也会有艰难或者隔阂，但毕竟能够获得一些理解与成长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曾对同学说过，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痛苦，追求理解而不追求怨恨。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在同学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以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这里，我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拥有传统人文的深厚资源、外来学术的精彩信息和百年老校的丰富积淀。它们浩如大海，蔚为壮观。也许，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师道与学统的交汇，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才是他们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学习的主要成果，也是当代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导同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知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完整过程。对老师来说，同学的敏锐、勤奋与活力，是那么的宝贵；对于同学来说，每一类学术题材的发现，每一种学术思路的开拓，每一个细节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学问启蒙和心灵震撼的作用，甚至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新认识。20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开辟了各自学术领域的新境界。它告诉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根本标志，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及其所包含的开拓性成就。有鉴于此，我们才应该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要求所有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许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李良玉

2011年8月30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 目 录

绪 论 .....	(1)
一、选题缘起 .....	(1)
二、学术研究回顾 .....	(2)
三、研究方法与目标 .....	(8)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12)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12)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21)
第二章 《东方杂志》的重要主编 .....	(43)
第一节 杜亚泉及其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43)
第二节 钱智修及其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68)
第三节 胡愈之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78)
第四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88)
第三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 .....	(127)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127)
第二节 发展教育论 .....	(136)
第三节 振兴实业论 .....	(147)
第四节 改革政治论 .....	(157)
第五节 传统文化论 .....	(171)

第四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	(179)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179)
第二节 与《新青年》的争论	(191)
第三节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201)
第四节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与科技知识	(214)
第五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232)
第五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	(249)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249)
第二节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256)
第三节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264)
第四节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271)
第五节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290)
第六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	(297)
第一节 中外矛盾与社会思潮的转向	(297)
第二节 述评欧美列强的主要矛盾	(302)
第三节 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动荡	(313)
第四节 批评列强在华的特殊利益	(325)
第五节 揭露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	(337)
第六节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345)
第七节 现代新知识与文化比较	(349)
第七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	(356)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各类文化的发展	(356)
第二节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360)
第三节 经济危机与不同的发展道路	(380)
第四节 民族独立与中国的国家建设	(398)
第五节 日本对华政策及日俄对华图谋	(421)
第六节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434)



第八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 .....	(450)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国人关注中日关系 .....	(450)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 .....	(461)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 .....	(528)
第九章 苏继庠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 .....	(555)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555)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559)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600)
附 录 .....	(613)
参考文献 .....	(627)
致 谢 .....	(635)



# 绪 论

2006年春季，南京大学博士生招考结果公布，本人荣幸成为李良玉教授的入门弟子。李老师培养学生有制度化的严格要求，我在近七年中，接受了严格训练。在李老师的建议下，我确定以《东方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这一学术资源，近年来也正愈益成为学术热点。

## 一、选题缘起

2006年9月12日，老师召集弟子们开新学期会议，要求我们新生，一要遵守校规；二要尽快适应新环境，三要抓紧时间，努力修完必修课，并尽快落实博士论文选题。会后，我感到压力很大，一是有人已有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二是面对年龄小许多的同学，我清楚自身的不足，还有一些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等。

2006年10月14日，我陪师兄吴渊去老师家，李老师逐一查看吴渊从老家收集来的资料，并帮助分析，我在旁边协助记录。李老师看到关键资料的欣喜、席地而坐检择资料的专注、对关键问题的判语、在引用上可能不足的关照等等，都成为生动具体的、可能在中规中矩的课堂教学中学不到的史科学专题内容。此次经历给了我信心和启示，同学在学业上的进步也给了我压力。由于这种心理，10月15日我即回家。此后一周左右，我在岳父陪同下，到他以前工作过的乡镇影剧院调研，将影剧院20多年的账本等资料找来，共有四大袋，同时也采访了几位当事人。由于资料不具有典型性等原因，已有的想法被李老师否定，我有些失落，却体会了搜集资料的艰辛。

为了夯实学术基础，并转变思想观念，李老师要求我从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入手，努力排除“干扰”，一本一本书看，并努力做读书报告。至2007年5月份，本人比较系统地读了现代化专题书籍，其间又接受了江苏省社科联有关课题的写作任务，在练习写作中，李老师都给予了及时的指导。

2006年12月22日上午9时许，李老师找我谈话，我以为是面谈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综述写作，意外的是，李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做了指示。李老师认

为，我可以有三个选择，一是自己确定一个选题；二是做苏南一个县（市）的现代化研究；三是以文献材料为主，研究一种近代知名杂志，如《东方杂志》等。对前面两个选择，李老师特别提醒我，在找资料时一定要具有典型性，有时甚至要有“缘”；对后一个选题，因为知名杂志多是“大块头”，所以准备吃苦。

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东方杂志》，在南大图书馆看到，全部《东方杂志》可以装满两个大书橱。在一时找不到电子版的情况下，我决定拍照，既可以保留在身边随时查阅，又可以兼顾工作，李老师也同意这么做。2007年春节前后，在完成现代化理论研究综述写作后，我即着手做拍摄《东方杂志》的准备工作。利用空闲时间，在师兄的帮助下，我购买和学会使用数码相机，找来《东方杂志》总目，添置硬盘等，并经常和好友讨论相关的学术问题，师兄弟给了我学习和生活上很大的帮助。

从4月初开始拍照，每天在宿舍、图书馆和食堂之间，“三点一线”式的生活基本上是固定的。先在宿舍把两块电池充好电，然后去图书馆，每半天可拍摄约3号《东方杂志》、近300多张图片。其间需要用约三块电池的用电量，故在拍摄的同时，另一块电池可以充电，然后利用照片拷入电脑、电池在宿舍充电的间隙，去食堂吃饭。特别是晚自修期间，我得到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友好关照，下午下班前就把资料放在工作台旁，然后晚上去拍摄。经过5个月的艰辛工作，克服了暑期高温等困难，我于9月初完成了近四分之三的《东方杂志》的拍摄任务，形成约116G的电子资料。这期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经一位师兄介绍，我在网上订购到了《东方杂志》前2卷、20卷到32卷的影印合订本（57本），使我拍照工作压力减少了许多。李老师要求我，选题定下来后要坚决不动，我尽管心理压力很大，但下决心面对这个“大块头”。

## 二、学术研究回顾

《东方杂志》是近代史中第一份民营的综合性刊物<sup>①</sup>，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杂志创办于1904年，经过多位主编的努力，成为众多文化人趋附、汇集和交流学术思想的场所，共发行44卷，发表各类文章20000多篇，文学文章1000余篇，其中创作小说及翻译文章900余篇。由于时代动荡，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东方杂志》受到严重摧残，后于1948年12月终刊。蓦然回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东方杂志》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夺目的智慧之光，它留下的文化深痕，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说它是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是说它提供给社会的知识有现代

<sup>①</sup> 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页。

性，它在现代社会转型方面有地位，它在近代以来文化事业发展史上有地位，它在经营管理文化产品上提供了现代企业经验，它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等等。

1949年以后的30多年中，主要受社会政治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渐渐成为中国大陆学者改造思想、学术研究的理论底色，这一结果，当然与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也有一定的联系。诚如张玉法先生所言：生长于近世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为战争所苦，及长又耳闻目见国家、社会为军人、政客的权力斗争所困，实不能无所感，……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实左右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虽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也影响军事、政治和外交。”<sup>①</sup>所以，海峡两岸的近现代史研究，一度都集中于重大历史事件、战争、人物的活动等方面，而对近世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则关注不够。

杂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的重要媒介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中，学界出现的大批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等著作，多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为研究重点，对于近代其他刊物只是一般性的介绍<sup>②</sup>。由于受特定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影响，研究者关注《东方杂志》的力度不够，研究《东方杂志》有影响的成果不多，仅有如祁龙威先生主要利用《东方杂志》的相关资料，研究20世纪初西方列强争夺中国铁路路权的情况等<sup>③</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三联书店编辑部1957年编有《“东方杂志”总目（一九〇四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这本资料汇编直到今天也是研究《东方杂志》很好的参考书。

20世纪初，首先出现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知识，曾经是中国文化人努力学习的对象，也自然成为《东方杂志》中诸多文章的理论底色，《东方杂志》努力介绍这些新理论，积极参与中西方文化交流，并努力述评现实，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发挥过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大陆史学界，为何重新关注《东方杂志》？至今又取得那些

① 张玉法著：《修订版序》，《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2版。

② 参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等。1980年代后，大陆学界对《东方杂志》有一般性介绍的文献，如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1928年初版）；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宋应离：《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商务印书馆还分别于1987年、1992年、1998年出版过《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

③ 祁龙威：《论清末的铁路风潮》，《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大陆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前利用《东方杂志》资料的论文还有如，杨炳延：《1909年江南人民反对英国福公司就地售煤的斗争》，《史学月刊》1965年第3期，于中：《英帝在安徽铜官山矿的侵略活动》，《史学月刊》1960年第1期。

研究成果? 海外学者又有怎样的研究动态?

中国大陆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社会文化出现多元化, 学术研究也开始出现观念转变的趋势。《东方杂志》是了解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料, 它曾是文化人的精神家园之一, 经历过多个文化热点的讨论, 有些讨论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在五四运动 80 周年这一特殊时期, 《东方杂志》等近代刊物和相关学术思想的研究, 成为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学术热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大陆学术界研究《东方杂志》, 以 2000 年为界,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80 年代初, 商务印书馆有关人物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其中, 王云五曾在民国年间, 主编过“大学丛书”, 而 80 年代中国大陆出现过在王云五的名字上“打墨钉”的闹剧, 并引起时人的不满<sup>①</sup>。1980 到 2000 年, 大陆学界研究《东方杂志》主编时, 关注最多者是杜亚泉等人。而杜亚泉研究则以 1993 到 1994 年这两年最为热闹, 并一度有升温趋势。其中, 杜亚泉与陈独秀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 则成为学术热点, 还出现相关专著, 如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许纪霖等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高力克著《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等等<sup>②</sup>。其他主编研究中, 胡愈之研究包括他本人所作《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等文献在内, 学术界多述评他对革命出版事业的贡献<sup>③</sup>。值得注

① 刘宏图:《何必隐名埋姓》,《读书》1981 年第 2 期。

② 相关专著还有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许纪霖著《智者的尊严》, 学林出版社 1991 年版; 郑师渠、史革新著《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等。

③ 关于胡愈之与《东方杂志》关系的文章, 有乔秀云:《出版家王云五与胡愈之关系探讨》,《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等。关于《东方杂志》其他主编和编辑的研究文章如, 罗娟:《孟森与〈东方杂志〉》,《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1 期; 金立勤:《金仲华的编辑生涯》,《新文化史料》1998 年第 3 期; 史之:《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世知人”张明养事迹片断》,《世界知识》2006 年第 13 期; 陈鲁直:《学界楷模陈翰老》,《太平洋学报》1997 年第 3 期; 等等。



意的是，关于《东方杂志》经营者的研究，张元济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sup>①</sup>。而这一时期仅有少数人注意到《东方杂志》，如有人认为这一杂志“具有较高的资料与学术价值”，但论者的主旨在于说明台湾1967年复刊《东方杂志》及重印旧版《东方杂志》的情况，并认为台湾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所发文章，却一改曾为海内外学人所肯定的办刊主旨，全无学术意向，多为粉饰、赞美台湾当局和歪曲、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之作，与该刊复刊时所宣布的编辑方针大相径庭”<sup>②</sup>。说明，学界看到了台湾重视《东方杂志》学术研究，但海峡两岸的学术观念差异明显。

第二阶段是2000年以来，大陆学界出现“《东方杂志》热”，一方面表现为继续研究《东方杂志》主编及相关人物，另一方面则是概述《东方杂志》相关主题内容的论文越来越多，同时，还出现专著。在人物研究中，杜亚泉依然是热点人物之一，笔者统计，2000年以来，在题目中出现杜亚泉名字的学术论文，每年就有3篇左右，特别是近年来，更多人肯定杜亚泉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地位。在杜亚泉研究的势头持续不减之时，王云五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个新热点。笔者统计，相关王云五的研究论文，20世纪80年代仅约7篇、90年代约17篇，而自2000年以来的十年中，却猛增到80多篇，特别自2007年以来，研究王云五的学术论文每年平均也达到7篇以上，同时出现多本专著<sup>③</sup>。从人物研究中可以看到，海峡两岸关注《东方杂志》，尽管在时间上有交错，即台湾学界的相关论著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而大陆学界则主要在1990年以来，不仅出现“共同”的学术需求，而且在学术观念和具体人事评价上越来越接近，

① 研究张元济的主要成果如，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995年又出增订本，书名相同）；[新西兰]叶宋曼瑛：《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树年主编、柳和城等人编著：《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新西兰]叶宋曼瑛（张人风等译）：《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王英：《一代名人张元济》，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陈建明：《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柳和城：《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汪凌：《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论文有张人风：《张元济传记和研究专著简介》（见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② 吴斯清：《〈东方杂志〉及其台湾版》，《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③ 研究王云五可参见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徐有守：《出版家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大陆学术界相关文章，可参见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研究论文如，吴迪：《王云五：半生年华献“商务”》，《编辑学刊》1998年第5期；郭太风：《王云五简论》，《史林》2000年第4期；等等。

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也已经成为研究民国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共享文化平台，甚至可以成为衡量学术界观念变迁的一个标尺<sup>①</sup>。

大陆学术界研究《东方杂志》，在总体趋势上论文数量不断增多，特别自2008年以来出现“井喷”状，2010年的相关论文数量已有约8篇。在这期间，另有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著《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大陆第一部研究《东方杂志》的专著。该著除导论与结语外，共分八章，有人评价这一著作：“此书以《东方杂志》为特定对象所作的‘解剖学’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对探索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出版文化史、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在新的研究对象乃至建构学术范型方面，实已开拓新境。”<sup>②</sup>

但从现有成果看，大多只是述评《东方杂志》某类专题性内容<sup>③</sup>，说明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东方杂志》，也试图解读《东方杂志》相关专题中的文本

① 大陆学术界有关杜亚泉、王云五等人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在下文相关章节具体论述。

② 闵定庆：《公共舆论与现代性的展开——〈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品读》，《中国出版》2007年第3期。

③ 2000年以来研究《东方杂志》相关专题的论文如，赵泉民：《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郑大华：《“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李安山：《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从〈东方杂志〉看日俄战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谢振声：《冯宾符与〈世界知识〉》，《世界知识》2007年第2期；李中平、刘亦明：《九一八事变前后〈东方杂志〉对中日关系问题的研判》，《云梦学刊》2008年第3期；魏原：《中国时人对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以〈大公报(天津版)〉和〈东方杂志〉为主的考察》，《云梦学刊》2008年第3期；郭渊：《从〈东方杂志〉看晚清政府对东沙岛的主权交涉》，《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4期；唐艳香：《从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到婚姻自由——1904—1919年间〈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王欣瑞：《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肖高华：《1922年知识界的制宪讨论——以〈东方杂志〉“宪法研究号”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段颖惠：《清末反教思想的变迁——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潘晓婷：《从传播立宪开始的上下求索——试论1904—1911年的〈东方杂志〉所作出的西学传播努力》，《新闻传播》2009年第10期；陈学然：《〈东方杂志〉所见之清末藏事评议：以1904年英军侵藏为例》，《西藏研究》2010年第5期；孙语圣：《〈东方杂志〉与中国近代灾荒》，《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汝艳红：《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郑师渠：《现代中国媒体对日本论评的转变——以〈东方杂志〉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初云玲：《〈东方杂志〉的广告文本探究》，《今传媒》2011年第1期；等等。

内容，而全方面概述《东方杂志》者不多<sup>①</sup>。这一研究还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一杂志的具体期数为多少？主编究竟有哪些人？这些主编负责时限如何？各个时期的主题内容及风格是什么？不同时期作者队伍状况如何？等等。

结合笔者在本研究中对相关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可以看到，现有述评《东方杂志》的论文，不仅多有错误，甚至还有以讹传讹的不良现象。同时，杜亚泉等人的研究，从表面上看很“热”，但全面解读他们的文章，以文章内容揭示其思想贡献的成果并不多见，尤其是《东方杂志》中大量人物与相关内容，多未进入学界视野。比如，担任《东方杂志》主编时间最长的钱智修，至今未见任何研究性文字，说明《东方杂志》研究还存在大量学术空白。《东方杂志》不仅有丰富专题内容，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其中特别需要从基础做起，以不断推进学术发展。

笔者对海外学者研究民国杂志的成果了解不多，所见引用《东方杂志》者，如周策纵（Chow Tse - tsung）所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哈佛大学1960年版），另有张朋园、郭正昭、蒋永敬等人，引用过民国年间的报刊材料<sup>②</sup>。近年也有专门研究报刊的文章，如胡晓真作：“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可见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就《东方杂志》研究而言，笔者已见黄良吉先生所著《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

黄良吉，1940年生，台湾省人，台湾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生产力及贸易中心”编译、《中央日报》编辑。《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为王云五主编“人人文库”之一种，1969年1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著作主要从传播学与新闻史的角度，述评1948年前《东方杂志》的“历来言论表现，以及外交、学术上的报道”，共分九章，另有前言、提要，后附结论。而在其中，黄良吉没有对杂志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严格的时间划分，故该著中划分的所谓五个时期，可以视为五个专题研究。

1967年台湾复刊《东方杂志》，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影印了《东

① 2000年以来，大陆学术界从总体上述评《东方杂志》的论文如，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东方》2000年第11期；葛飞：《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张凤英：《论〈东方杂志〉的文献价值》，《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石雅洁、李志强：《〈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8期（下半月）。

② 相关研究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如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近代科学思潮社会冲击研究之一》，第3期下册，其中引用《东方杂志》第22卷22号内潘光旦的一文章；张朋园：《时报：维新派宣传机关之一》，第4期上册，其中讨论《时报》的主要影响；蒋永敬：《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第4期下册，其中引用《知新杂志》等材料。

方杂志》50卷。有人认为,由于受台海政治形势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出现消退现象,而大陆的相关研究相对出现蓬勃发展之势<sup>①</sup>。

### 三、研究方法 with 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多年,大陆对近代杂志的研究重视不够。主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成果,又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现有《大公报》研究,主要有三种做法。

第一,资料收集法。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如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共五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对《大公报》创办历史的回顾,另三篇是就《大公报》的主要作者与该报的关系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为《大公报》的社评选登,共41篇正文,主要是《大公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表的得力之作,或许这些社评可以成为评价《大公报》及总结其办报理念的主要依据;第三部分为《大公报》“星期论文”选登,这是《大公报》比较有特色的栏目。

第二,历史分期法。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如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作除了前言和后记外,分为十一章,其中前五章主要介绍《大公报》的四个创办时期,以主要创办人的理念介绍为主,突出不同时期的内容特色;中五章则主要介绍《大公报》的不同版本,从不同的时代背景介绍各自不同的经营和遭遇;末一章主要是对现状的介绍。

第三,专题研究法。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如侯杰著《〈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著作主要以《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内容,一是侧重于对《大公报》的主办人之一——英敛之的思想的研究,一是侧重于对《大公报》的一个阶段内的不同主题的介绍,分别从政治参与、民智启蒙、社会性别、社会团体等角度进行总结和解读。

上列三种研究方法各有特点,资料收集法的优点是杂志本身特点决定的,主要是介绍“说什么”,缺点在于因主观原因,可能不能全面反映报刊的重大主题,更不能系统展示各类信息所反映的环境和变化。历史分期法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也包括了一定的理论解读,重点在于“产生什么效果”。由于特定的理论分析需要,不同时期内容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出现不同认识,同时可能不能具体分析每一个具体阶段的内容主题,从总体上把握一个杂志的特点和主旨也可能会有

<sup>①</sup> 冯启宏:《战争与文化:近十年抗战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回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第198页。



不足。专题研究法是解读杂志的主题思想，其优点在于能够从不同视角灵活地展示不同的主题内容，重点介于“说什么”与“产生什么效果”之间的联系，其缺点在于作者所选择的理论视角，与文本原旨之间可能会出现重大差异。当然，以上所列三本著作充分体现了各自研究方法的优点，也努力克服了缺点。

研究杂志可能应主要有四种解读方式。

第一，事实解读。即对杂志的创办者、主编、读者、文章等要素进行介绍，就一篇文章而言，要介绍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后有过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第二，文本解读。即对杂志的文字内容的研究，分析它留下来的文本的基本内容。

第三，作者生平解读。对作者生平的解读，是要搞清楚作者的基本经历，结合文本，弄清楚作者为什么在某一特定时期写这篇文章？他在想什么？他要表达什么？这就要结合文本对作者的生平进行解读，并努力搞清楚现有的相关研究状态。

第四，文化生态解读，或者说文化环境解读，也可以说是思想史的解读。只有把作者放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弄清楚他周围是什么环境？在思想界有什么影响？才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也许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但标准的解读是把这四种解读结合起来。其中文本解读是基础，因为其他解读有可能做得出来，有可能做不出来。如《东方杂志》有些文章的作者是谁都可能搞不清楚，只能就文本解读文本。作为杂志，它的最现实的、最主要的成果也是文本。

因此，研究杂志，文本解读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是杂志研究的主体。现在有些研究，把文本解读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以概念先行，实际上许多基本事实的解释都不对。

文本解读当然有其缺陷，如果不能和其他解读结合起来，就无法把杂志研究透；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条件将以上四种解读很好地结合起来，文本解读至少可以把杂志的主体内容分析清楚<sup>①</sup>。

首先，笔者以为，研究《东方杂志》必须弄清楚杂志的要素及各自的发展状态。

杂志的要素主要包括出版机构、主编、作者群、栏目、文章等，同时还包括主题变化、读者反映、社会影响、管理方法、编辑风格等，前者可以作为杂志的基本要素，后者可以称为杂志的环境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杂志生存的基础，

<sup>①</sup> 关于杂志研究的四种主要解读方式，主要源于2008年9月20日李良玉教授在笔者论文开题报告会上的指导发言。

